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Volume 3 新第三期 Article 19

9-2006

Cultural realism :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Johnston, Alastair Iain)

Ruilong CENG

Xiuqiang ZH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9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曾瑞育、鄭秀強 (2006)。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Alastair Iain Johnston)。《嶺南學報》，新第三期，365-372。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99/vol3/iss1/19

This 新書評介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Xiii+(3)+307+(2)pp.

從事戰略文化研究的學者相信，戰略除了是一個現實政治的課題，也是一個文化的課題。二千多年來，戰略深深地植根於人類的文化傳統中，受到意識形態、價值體系等種種文化要素的薰陶，而其本身也變成了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基於戰略行為受到文化要素的影響，戰略取向亦早已成為文化傳統的一部分，戰略決策不可能完全理性，祇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被認為理性。對於某個民族來說是完全理性的行為，對於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對手來說可能是愚不可及，或完全無法理解的瘋狂行為。不同文明的接觸激化戰略思維中價值體系的互動，也成為戰略文化研究的理想素材。冷戰時期成為戰略文化研究的溫床，學者相信美國和蘇聯的戰略取向都各自受到本身文化價值所影響，形成鮮明對比。例如蘇聯的戰爭方式偏好於先制攻擊，而美國在運用武力時則懷有十字軍的情意結。至於中國的戰略文化，則被形容為政治對武力的維制，企圖以盡量微量的軍事力量解決衝突。近十年來，學者在歷史上找到更多素材加以研究，尤其是分析不同文明和價值體系接觸的時候產生具爭議性，或看似非理性的行徑，運用戰略文化角度來觀察較能凸顯歷史和文化的特質。至於研究的角度也深化到討論不同文化對暴力的不同制約，社會規範對軍事力量的模塑，和意識形態對戰略取向的界定等問題。

中國由於本身源遠流長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同樣成為戰略文化研究的重要領域。九十年代初出現了一些討論中國文化對暴力的觀念的作品，[1]而九十年代中期，江憶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文化現實主義：中國歷史上的戰略文化與大戰略取向》(*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更是其中富有系統的代表作。江憶恩和一般強調「觀德不耀兵」、「不戰而屈人之兵」等信念的學者不同，他認為中國傳統戰略文化中含有以武力解決問題的特性，更將這種侵略性從理論上歸納為「文化現實主義」。在闡釋毛澤東

[1] Mark Edward Lewis,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Jonathan N. Lipman and Stevan Harrell,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Jonathan R. Adelman and Chih-yu Shih,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93).

的軍事思想時，他也沿此思路分析毛澤東的思想「典範」中對衝突的性質、對敵對關係和對武力效益的理解，從而得出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也是一套「文化現實主義」產物的結論。[2]

江憶恩指出，講究強權政治 (power politics) 的現實主義觀並非一些可以超越歷史傳統而存在的客觀現象，而是深嵌於文化領域內的一種主觀意識與取向。他首先嘗試以「文化現實主義」詮釋明代的戰略思維，並以此理論為中心，試圖涵蓋中國從歷史傳統延續至現代的「戰略文化」及大戰略思想體系。通過對《武經七書》一系列的研究，並對若干議論邊防的明廷奏摺加以抽樣分析，江憶恩總結出一個中國戰略文化的基本型態，並稱之為「戰爭邊緣典範」(parabellum paradigm)。為了對「戰爭邊緣典範」提供系統化的解釋，他塑造出一個三度空間的等邊立方體模型，並以立方體的三個剖面分別代表中國戰略文化的三種取向：(一) 相信人類社會運用暴力解決問題的頻率 (frequency) 偏高。中國人遇到與外國發生衝突時，會偏向相信運用暴力是解決衝突的有效途徑；(二) 傾向用零和對策 (zero-sum) 的方式去考量危機與衝突。中國人傾向相信利益難以調和；(三) 認為運用暴力或施以強制性戰略 (coercive strategy) 對付敵人，要比防禦、調停，或妥協等方法來得更有效益。

由於以上三種取向皆偏向於積極攻略，江憶恩認為傳統中國的大戰略取向是以攻略為核心，妥協和防禦祇是力量不足時的權宜之計。雖然中國傳統思想時常提到「義戰」、「非攻」、「觀德不耀兵」等觀念，但祇能算是理想政治 (idealpolitik) 的產物。此等產品作為象徵戰略 (symbolic strategy)——將軍事攻略合理化的政治託詞而存在，與戰略實踐毫不相干。江憶恩更進一步認為，象徵戰略及現實戰略之間所產生的脫節現象，可透過以「權變」為核心的一系列文化規範不斷的協調，令兩組本不能共存的戰略取向得以並行不悖。他因此指出，中國戰略文化與西方現實政治 (realpolitik) 強調軍事優勢的戰略文化基本上同出一轍。換句話說，「文化現實主義」可以存在於不同文化領域之內，「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 的傳統並非西方所專有，在中國歷史上也同樣可以找到。這和一般認為中國文化以道德法紀制約暴力，反對窮兵黷武，愛好和平的說法大相逕庭。

---

[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16-68. 不同的意見，參Qinxin Ken Wang, "Strategic Culture and Mao Zedong's Military Strate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Perce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ugust 3, 1999.

回顧十年以來國際關係和戰略文化理論的發展，可以看到江憶恩的看法回應了新現實主義與各種國際行為的文化解釋之間的爭論，將之歸結到「文化現實主義」的觀念中。這種觀念既「文化」，又「現實」，具有較大的兼容性。和各種各樣的現實主義一樣，[3] 江憶恩傾向主張弱肉強食的現實政治取向具有詮釋國際行為的作用。可是這種取向並非來自國際間勢力平衡的結構性原因，而是來自於文化傳統。這種解釋十分配合學術觀點發展的方向。首先，文化現實主義的提出支持了各種反對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如Robert Owen Keohane、 Richard Ashley都批評新現實主義將國際行為歸因於實力對比的結構，有失於簡單化，忽略了不同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行為取向，而現實主義祇是西方社會的一種對國際行為的一種理解。[4] 江憶恩提倡文化傳統形成現實主義，正合乎這種思路的發展。

同時，以文化來解釋對外關係也是七十年代末以來的一條新思路，早期的詮釋者有Jack Snyder，繼而有Ken Booth、Colin Gray、Carnes Lord、David Jones、Bradley S. Klein等。[5] 九十年代出現組織文化 (organizational culture) 觀點，持此論者相信戰略取向受到軍隊的組織文化影響。Jeffrey Legro 和 Elizabeth Kier 的研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列強所運用的戰略與其軍隊內部的組織文化有關，開啟了一

[3] 現實主義的各種模式，見 Benjamin Frankel, ed., *Roots of Realism* (London: Frank Cass, 1996).

[4] Robert O Keohane, "Realism, 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26; Richard K. Ashel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2 (1984), pp.225-86.

[5] Jack Snyder,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Caveat Emptor!" in Carl G. Jacobse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3-9; Ken Booth,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Affirmed," in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pp.121-128; Colin Gray, *Weapons Don't Make War: Policy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3), "Introduction," pp.205 (f.n. 61), 218 (f.n. 18); Colin Gray, "National Styles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6:2 (1981), pp.21-47; Colin Gray, *Modern Strate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29-151; Carnes Lord,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5:3 (1985), pp.269-293; David R. Jones,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n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Bradley Klein,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ce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8), pp.133-48.

個新的研究方向。[6] 江憶恩沒有深入探討組織文化，但他也相信文化是軍事信念的重要構成內容。總的來說，江憶恩具有對學術發展的敏銳觸覺，能充分把握研究的動向，把「文化現實主義」的概念提升為理解現實主義的途徑。他的學說是一個不容忽略的觀念。

搭建科際整合的橋樑對研究歷史和研究戰略文化的兩組學者都有幫助和貢獻。這方面的貢獻，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和Arthur Waldron 對江憶恩書所寫的書評已作充分評價。[7] 我們也基本上同意：(一) 現實主義是文化的產物。過去部分西方學者受到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 的影響，[8] 過分強調國際間權力結構和力量對比對現實主義取向形成的決定性，而江憶恩以傳統中國為例，展現文化傳統在國家對外行為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值得學界進一步注意；(二) 江憶恩的學說確實道出中國歷史上部分朝代窮兵黷武的文化背景。中國古典兵學雖然存在大量強調道德為本，軍事力量為末的言論，在不少情況下卻未能遏止統治者開疆闢土，加兵於人的野心，如漢武帝伐大宛，隋煬帝三征高麗都是讀史者耳熟能詳的。

然而江憶恩在論證過程中，對概念的使用仍有欠缺嚴謹之處，以致對史料的詮釋產生誤導，結果對中國人偏好強權政治的取向有誇大之嫌。商榷「文化現實主義」這一種學說，遂有必要了。茲所商榷者有若干是關於史料詮釋的，更重要的是關於理論和概念上的漏洞，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這些有待商榷的環節如果不加釐清，將變成容許該學說片面地誇大中國傳統文化的侵略傾向。

江憶恩要觀察的對象是中國傳統中的大戰略取向有沒有侵略成分，但他沒有釐清戰術和大戰略這二種不同的戰略概念，在處理史料時把上述不同層次的戰略行為混為一談，以致在尚須深入探討的問題上過早下定論。例如在討論明代邊防奏摺為案例時，他多處將明軍戰術性反攻，向包圍城池的蒙古軍劫寨夜襲，及日常訓練中組織炮火掩護步騎進擊等戰術細節，含糊地解釋為傳統中國

[6] 有關軍隊組織文化的定義，見 Elizabeth Kier, *Imagining War: French and Britis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 27-30; 又見 Jeffrey W. Legro, *Cooperation Under Fire: 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ar II*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7-29.

[7] Joseph W. Esherick, book review o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3 (August 1997), pp.769-771; Arthur Waldron, "The Art of Shi," *The New Republic*, 216 (June 23, 1997), pp.36-41.

[8] 結構現實主義又稱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強調國際結構對國家行為的重要影響，代表人物有 Kenneth Waltz。

大戰略具有侵略取向的表徵，就很值得商榷。他解釋于謙 (1398-1457) 在景泰三年 (1452) 的〈請置五團營疏〉時竟得出于謙相信「軍事上的過人實力是擊敗敵人的正面因素」的結論。[9] 他這句話雖未犯嚴重曲解，可是審察一下奏疏的原文，于謙談到的都是戰術細節：

> 又敵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敵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彼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敵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銃、飛槍、火箭、弓矢齊發。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分調精銳，馬軍用長槍、大刀、勁弓射斫；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敵陣。[10]

憑奏疏的這段文字，有沒有可能看出明朝軍隊具有攻擊取向？這個問題涉及兩個層次。首先從史料本身分析，這段談的是假設明軍遭遇蒙古軍，在野戰中居於守勢的戰況。其中「馳突前來」、「彼若來」、「馳馬來攻」，說的都是蒙古軍；而「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堅陣不動」諸語，指的都是明軍，這是十分明顯，不會誤讀的句語。憑這段文字雖足以討論明軍假如遇上蒙古軍，在戰術守勢下應如何佈陣應敵的取向，但有沒有可能據此去討論明軍在戰略上的攻勢取向？似乎很難給予肯定的答案，因為奏疏涉及的祇是戰術層面，而非戰略甚至大戰略的層面。「又以大將軍擊之」一句確含有一點攻擊意味，但「大將軍」是一種火砲的名稱，「擊之」是指射擊之意，和大戰略取向恐怕也不能說存有很密切的聯繫。

再從理論上分析，一個國家的大戰略取向能否從其軍隊的戰術中看出？也是一個需要小心處理的問題。如果使用廣泛的戰略定義，戰術固然可以被理解為戰略之一種，[11] 但江憶恩要觀察中國傳統中的大戰略取向是否存在侵略或

[9]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pp.196. 引文為筆者所譯，下同。

[10] 清高宗編，《明臣奏議》(《叢書集成》初編本)，卷 3，頁 50。

[11] Edward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82-90.

使用武力的傾向，而戰術 (按一般理解) 卻是預設武力衝突已經發生時，如何運用成序列和機動的戰鬥單位進行戰鬥的指引。[12] 換言之，戰術所針對的祇是「如何」，而不存在「應否」使用武力的問題。這個層次的現象有沒有可能用來證明一個國家是否傾向於使用武力呢？在我們的認知範圍內，答案很可能是存疑的。如果給予肯定答案，那麼江憶恩必須詳細研究明人所認知的戰略結構是甚麼一回事，和我們認知中的戰略結構存在哪些程度上的距離，尤其是大戰略和戰術的關係存在哪一種特殊性，而不能以簡單化的「中央典範」(central paradigm) 來概括，[13] 否則仍是陷入了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 的謬誤。

江憶恩此書的第二個問題是方法論上的自相矛盾。他一方面看到言論和行為之間有脫節，另一方面卻仍然祇以言論為分析中心，而忽略行為。他從研究中國古典兵學著作和明代的邊防奏章，得出中國人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佳兵不祥」的觀察，這種言論很可能祇是滿足其象徵和理念層次的空洞修辭。至於大戰略取向，他仍是以現實主義為依歸。不過他這現實主義不是源出多元的國際無政府 (international anarchy) 狀態，而是以《武經七書》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兵學。這種看法不無見地。值得指出的是，這種現實主義既是「文化」的，它就有呈現為象徵、理念，甚至是純粹飾辭的可能。而這樣一來，哪些現實主義的言論確有實際運作的指導作用，哪些僅僅是充撐場面的說話，不可能光憑語句抽樣統計和圖示概念 (cognitive mapping) 來分析，而必須落實到具體決策過程的研究。然而整本書的分析都停留在兵書和奏章的言語上，具體決策過程的研究完全欠奉。江憶恩再三警告讀者不能相信表面言辭，自己卻正犯此失，實在可謂令人費解。

譬如在詮釋王守仁 (1472-1528) 的〈陳邊務疏〉時，江憶恩毫不置疑地說：「當談及如何挫敗降服敵人時，軍事力量又一次直接或間接地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份奏章直接地將指揮的質素與破敵衛國連繫起來，其餘手段包括運用機動部隊伏擊敵軍，包圍並攻擊敵軍，突然襲擊」等等。[14] 對照一下原文談的卻是：

> 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周悉萬全，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我矣。由是我足，則敵日以匱；我盛，則敵日以衰；我怒，則敵日以曲；

[12] Joint Chief of Staff,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 (New York: Arco Publishing, 1988), pp.351.

[13]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pp.61-108.

[14]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pp.199.

> 我逸，則敵日以勞；我堅，則敵日以虛；我銳，則敵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敝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15]

王守仁在這裏討論的是一種彈性防禦的處境，強調利用防禦的優勢，挫損敵軍銳氣，再繼之以一個出其不意的反擊。這種言論能否看作明軍具有攻勢取向的表徵，很成疑問。充其量，這裏談到的依然是一個由守到攻的轉折，而不應當看成鼓吹攻勢作戰的言論。

不過撇開純粹文義理解的差誤，這裏仍然出現兩個可以進一步商榷的地方。一個是該怎樣看這些奏章的問題，另一個是該怎樣看現實主義言論的實際功能的問題。奏疏史料對歷史學者本應一點都不陌生，可是我們該怎樣判斷奏疏在戰略決策過程中的角色，過去由於科際整合的努力有限，這種論著並不常見。奏疏究竟代表言論還是行動？在分析古典兵學這種被看成純粹理論性之物後，江憶恩在討論明代邊防奏疏中的現實主義取向時，便頗似企圖把它當成具有實際指導意義的證據來看。能否如此似應有所保留。奏疏的言論雖有指導行為的意願，它本質上始終還是言論。換言之，我們仍難以有充分根據去將言論看作與戰略運作之間存有必然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江憶恩既然提倡文化現實主義，他該很清楚現實主義既是文化的產物，就存在浮現為象徵/理念層次的產物，和實際行動出現差距的可能。古典兵學著作或明人奏章中鼓吹使用武力，或諸如此類的言論，能否看作中國戰略文化中具有侵略特質的證據？簡單來說，即使真的在言論上鼓吹打仗是不是一定代表真的要打和懂得打？在文化現實主義的理解框架當中，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言論正因為是文化的產物，所以也可能僅作為象徵理念，甚至飾辭而存在，而與戰略的運作毫不相干。其實王守仁在下一句已提醒了讀者：

> 抑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者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16]

[15]《明臣奏議》，卷9，頁167。

[16] 同注[15]。

這說明明代當時的邊關將領很可能僅視那些古典兵學的遺澤為空洞的老生常談。

歸納起來，*Cultural Realism*一書提出很多精闢見解，比如認為現實主義是文化的產物，及指出強權政治在傳統中國大戰略取向中不可忽視的地位，都是全書的價值所在。江憶恩有系統地將戰略文化的方法引進傳統中國兵學的研究領域，尤為功不可沒。同時我們亦不能不提出若干商榷。他的學說在論證上存在兩個模糊的地帶：首先，該書雖然對戰略文化的研究動向作出很詳盡的檢討，可是對戰略這個概念的用法有欠嚴謹，以致將戰術上或戰役上的攻擊取向與大戰略上的侵略性混為一談。明代奏章中關於埋伏、劫寨、向敵軍反攻等戰術或戰役動作的討論因而被提升到大戰略層次來評估，看成傳統中國戰略文化帶有強權政治的證據。這樣的論調說服力自然不足。其次，作者因為看到言論與行為之間存在的差距，遂覺得中國儒家理想中愛好和平的言論祇是表象，對戰略決策的影響力有限。本來言行差距是一個很可以深化的探研方向，可惜江憶恩在看到這一點之後，並沒有再進一步剖析傳統中國的戰略決策過程，反而自甘於停留在語句分析的層次上，這未免皮相。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指出古典兵學和明代奏章都含有相當份量主張攻擊的話語，可惜他充其量也祇能說明中國戰略文化的複雜性或二重性，不但鼓吹自保也鼓吹攻擊，然而由於兩者都祇是言論，談不上言論與行為的脫節有何關係。何況，他也沒有察覺到那些鼓吹主動攻擊的論調同樣可能是老生常談的空話。無論如何，此書作為科際整合的一本著作，在理論上確有創見，對易為人忽略的史實亦作出發人深省的分析，故值得對中國軍事及戰略有興趣的學者細心研讀。

曾瑞龍、鄭秀強
香港中文大學